

本刊主编：刘晓立
版式统筹：常 英
联系电话：0311-88643113
投稿邮箱：liuxiaoli0119@163.com

古籍保护

专刊

藏书报

2018年1月1日
总第27期

藏书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主办

编者按

人才是影响古籍保护事业进程的关键要素。自2007年至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人才培养工作已经开展了十年有余，期间举办了超过百期古籍鉴定、普查、修复、保护等各类培训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古籍保护人才匮乏的局面。随着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对古籍保护各类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为满足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需求，2014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加大与高校合作力度，分别与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签署了合作培养古籍保护硕士学历教育协定，四所院校于2015年正式招收古籍保护专业硕士，目前第一届学生已经毕业。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在我国尚处于初级阶段。

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有哪些成功经验，又有哪些问题出现，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开展人才培养？为此，本期《藏书报·古籍保护专刊》特推出人才培养专题，为读者呈现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的更多探索、经验，助力古籍保护事业走向更好的明天。



刘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法学院院长助理

刘强：让古保与文博有更多联动

□本报记者 刘晓立

1

藏书报：谈谈第一届古籍保护方向研究生的毕业去向和就业问题吧。

刘强：2015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物与博物馆硕士教育中心（现名“文法学院”）新入学的22名文物

保护专业研究生中，有6名选择了古籍方向，2017年7月，其中的5名研究生毕业（1名因追求论文的高品质主动申请延期毕业），分别到国家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凯帝珂广告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南

京尤里卡时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让博物馆教育更生动）、吉林省通化市科学技术协会就业。从上述就业去向看，2名研究生毕业后选择继续从事古籍保护工作，3名同学没有直接从事古籍保护工作。

2

藏书报：如何看待多数人未能选择在古籍保护领域就业的情况？

刘强：在学生们毕业求职的过程中，国家图书馆也非常用心地提供了一些不错的就业信息，如山东济南、山西太原、福建泉州等地的图书馆，但最终这些单位没有被同学们选择。其实，从各校其他专业看也是一样，有40%-60%的比例对口就业就是一个正常情况，求职地域、单位、薪资、离家远近程度等都是影响大家选择就业的因素。

古籍专业的研究生的求职心态可能分三种情况：一小部分人愿意毕业后放弃其他诱惑条件来继续从事古籍保护事业，另一小部分人无论如何也不想从事古籍保护领域继续工作，而大多数人都是随机型，如果在合适区域的省级以上图书馆中或一流高校图书馆中有古籍保护领域的岗位需求，那么可能就会去工作，否则就会流向其他文化类单位。相对于博物馆而言，艺术表现力的展示不是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有些同学更愿意享受博物馆带来的艺术氛

围。

从就业环境来看，一方面不少专家认为目前国内古籍保护人才奇缺，另一方面并没有见到省级图书馆或一流大学图书馆公布较多的古籍保护人才需求信息，这让古籍保护方向研究生们感到比较困惑。因此我建议：鉴于许多重要博物馆也藏有大量古籍，但是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单位提出用人需求，希望文化部或各省文化厅能够把博物馆对于此项工作的重视度也调动起来，引进古籍保护领域的专业人才。

3

藏书报：三年来，贵校在古籍保护方向的培养中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可以分享吗？

刘强：与其他举办古籍保护专业研究生教育的高校相比，我院地处首都，能够便捷享受高水平的师资和培养平台。我院古籍保护方向的专业必修课程主要是由国家图书馆的老师来承担，辅之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嘉德拍卖公司的老师；我院将古籍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将其放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这样的专业体系下设计课程。目前看来，这样做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古

籍保护方向的同学有机会听到其他类型文物或博物馆策展方面的优质课程，能够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缺点是：相对于其他类型的艺术类文物而言，古籍类文化遗产的艺术感不够突出，较难吸引学生兴趣。

这样的情况在2017级研究生中更加明显。今年我院文物专业有10名研究生选择了古书画保护方向（均为女生），没有人选择古籍保护方向。其实古书画和古籍多是属于纸质或丝质的有机质材料，有很多关联性，同学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性选择，主要

因素在于她们认为古书画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大于古籍，对于她们学习过程中艺术魅力的满足和更多就业岗位获得都有帮助。对此，在与有关研究生和老师初步沟通的基础上，我有如下想法：继续尊重学生们对于古书画保护方向的选择，但在其专业方向的理论及实践课程之外，还要兼修国家图书馆的老师开设的《古籍修复思想与技法》，并且在国家图书馆进行古籍装订和修复专业实践。这样既丰富了同学们的专业知识体系，也为国家古籍保护事业培养了潜在的人才。

4

藏书报：反思三年的培养过程，古籍保护作为一个“学科”是否成立？如何界定它更为合适？

刘强：我认为，古籍保护这个领域包含的知识很丰富，既包括对于古籍本身的直接保护，也包括对于古籍价值的间接保护。这两项工作虽然我们之前都在做

着，但归属于不同的知识体系，前者更接近于文物保护学或图书情报学，后者更接近于古典文献学。如果我们想要将古籍保护作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来设立，则既要有其研究和实践基础，同时也面临着不少困难。比如，我们到底应该先提出一个概念，在这个概念的统领下去开展具体工

作？还是先开展具体工作，自然地实现古籍保护的目的是呢？我想我们可以去尝试，提出“古籍保护”的学科概念，并且提出相应的理论体系去支撑，然后去大胆地探索。当然这其中需要有人去响应，有经费去支撑，而且一定会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是首先我们要去大胆地去探索。

5

藏书报：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刘强：我觉得对于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方式可以借鉴，尤其是在传统文化的符号和要素传递方式这个环节，许多策展单位做了很有效的工作，使得这几年非遗展示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古籍保护领域也可以加强策展工作，下一步我院也会加强这方面的课程设计。

另外，我认为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得吸引全社会来关注、推动这项事业。目前这项工作更多还仅限于学术界来推动，社会参与度还不够，普通大众目前还没有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投资者们也并未体会到投资此项事业能够获得什么收益。如果我们加大社会宣传力度，通过举办跨界论坛、讲座、展览以及进一步开发文创产品等形式，甚至设计好投资者的获利点，我

想全社会的联动效果会增加，古籍保护事业也一定会走向更好的明天。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 高端访谈

2014 年 11 月，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中山大学图书馆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签署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文献保护与修复方向）联合培养协议，2015 正式开始招生，今年已经是第三届。

林明：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林明：

以技艺传承型人才为培养目标

□ 本报记者 王雪霞 刘晓立

人才培养现状：实践课占全部学分的三分之二

藏书报：中山大学文献保护与修复方向人才培养如何开展的？

林明：作为图书情报专业下的一个全新方向，在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签署协议后，我们马上针对文献保护与修复方向做了专门的培养方案，对于学生必修的理论课与实践课，包括每个学期的课程安排，都做了有针对性的设计。首先，根据全国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要求，一些与图书情报相关的基础理论课是必修的，对于文献保护与修复方向也是必要的，它为学生在图情档领域就业打下了基础；关于文献保护与修复方面的理论课作为专业基础，也是学生必修的课程，其中涉及到文献保护理论、图书或其他修复对象的发展史、古籍保护与修复材料的认识等学科知识。此外比较大的一部分便是实践课程，也就是修复技艺，大概占全部课程内容的三分之二。

藏书报：实践课如此重要，师资力量是怎样的配比？

林明：实践课导师以本校图书馆修复中心和古籍特藏部的专家为主，授课和实践的地点也集中在本校图书馆，所有的实践对象都是真正的馆藏古籍。实践课的教学除了集中讲授外，学生实践操作都在老师日常工作的时间和场所，非常方便随时指导。

除本校的师资力量外，按照专业硕士的培养要求，我们还聘任了一批来自校外一线的业内专家作为校外实践导师，邀请他们不定期上课、开展讲座，比如国家图书馆、上

海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假期的时候，也会安排学生到相应单位进行实践，比如今年我们就安排修复方向的学生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室去实践了一个月，而去年暑假则是安排去国家图书馆实践学习。这样校内和校外相结合，无疑能够扩大他们的专业视野、知识面和实践经验。

藏书报：如此精心的课程设计，最终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林明：我们的培养目标是具有扎实理论基础、熟练操作技能的古籍修复技艺传承型人才，在课程设计方面体现出中西兼容、保护修复并重、理论实践同步的特点。

我校文献保护与修复方向的专业硕士是两年制，虽然选这个方向的也有部分学术型硕士和在职硕士是三年制，但总体来说时间很紧张。为了让学生们熟练掌握文献修复技艺，学校不仅常常鼓励学生所有课余时间都到修复室度过，还会根据课程的进展提供不同程度破损的馆藏，让学生们在真刀真枪的训练中提高。当然，修复对象也不仅仅局限在古籍，只要是馆藏的纸质文献，无论是中西文古籍，还是碑帖字画，我们都有相应的课程训练，帮他们掌握基本的技艺。

除了常规的实践课程外，我们还会安排一些国内外的实地考察和实践，让学生们接触不同的文献保护与修复的机构，了解行业的现状，扩大他们的视野。比如之前他们已经参观过国内手工造纸机构和馆藏修复机构、

商业修复机构和学校等，今年还去到了德国实践。

藏书报：中山大学在这三年培养中有什么独特的经验？

林明：中山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而且毗邻港澳，与国际联系也较紧密，我们图书馆从 2002 年就与美国德州大学文献保护与修复专业建立了合作关系，2009 年开始与德国有关机构开始联合举办古籍保护与修复的培训和学术交流，这对于文献保护与修复学科的基础建设、跨学科合作交流、国际交流都提供了很多便利。同时，中山大学图书馆是较早成立古籍修复中心的单位，其修复中心也是第一批和高校系统唯一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这为研究生培养提供了很好的教学实践基地。文献修复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理论建设也不可能脱离实践，一个好的实践场所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籍保护高端人才培养在我国从开展到现在也只有几年的时间，这几年中面临的问题还是不少。比如，国家对于高校设置的学科专业有诸多规定，我们只能在图书情报专业下设置一个方向，还没有列入到国家专业学科目录里，所以各个学校所进行的探索都有各自的特点。中山大学在培养方案上是偏重技艺传承方面，因为我们感觉到，掌握古籍修复技艺的职业人才不仅紧缺，而且是急需的。当然作为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除技艺外，还应该具有相应专业理论基础，和之前师带徒式的技艺传承是有所区别的。

问题：招生制度、用人机制与人才培养的衔接尚存在问题

藏书报：作为一个新的学科方向，目前招生情况如何？

林明：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采取的是先入学再分具体方向的模式，根据学生的意愿选择确定。三年里，文献保护与修复方向招收的学生人数分别是 10、12、6 名，数量不是很多。

从这几年的招生情况来看，国家对于硕士的招生权相对集中，都是由教育部安排统一考试，图书情报专业就是考英语、政治和管理类综合，完全不涉及相应的专业知识，考试并不能起到筛选的作用。中山大学还是入学之后再选方向的，导致复试也无法加入针对文献保护与修复方面基础与条件的考核内容，所以选读这个方向的学生背景多种多样，这也意味着部分学生入学后在文献保护与修复方面是零起点的。这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据我所知，国外文献修复专业的研究生在招考时，会要求其提供修复作品，进行有针对性的考核面试，能够招收到真正具有这方面潜力的学生。而我国暂时还是采取成绩上一刀切的方式。

对于在职修复人员，我们学校采取提前面试的方法，通过考前面试的文献保护与修复系统的在职考生，只要达到全国的专业硕士复试分数就可以直接录取，这个分数线往往会比我

校的复试分数线低 20 分，大大方便了在职人员报考。

藏书报：第一届学生大多应该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了，情况如何？

林明：如今，第一届文献保护与修复方向的专业硕士已经顺利毕业了，10 个学生里，有 4 个是在职，2 个是学术硕士，剩下的都进了图书馆，但除了在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张竹悠同学确定是做修复外，其他都需要在图书馆轮岗，还没最后确定岗位。

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从事修复工作的人数太少，人员缺口比较大，但从此前的经验来看，也会出现科班出身找不到工作、用人单位找不到合适人才的情况。这有聘用体制的原因，也和毕业生的自我选择有关。尽管获得硕士文凭已经从硬件上提高了入门的竞争力，但学历越高对就业的期待值也越高，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自身情况，同样会对就业造成压力。古籍藏量比较多的大馆、省馆，开展古籍修复工作较早，发展的也比较成熟，这意味着其人员梯队建设也已经比较完善，缺口较小。这种单位对修复人才的需求量并不大，入职要求也更苛刻。随着古籍保护计划的不断深入，市级馆或文博企业甚至二三线城市、偏远地区的修复力量会

慢慢成长起来。学生在择业的时候，要有充分的认知。

此外，从第一届同学的就业和第二届同学找工作的过程，还反映出一些情况值得思考：图书馆等事业单位用人都要经过当地的人事管理部门，其在公开招收的专业目录中有诸多限制，比如古籍保护方向的专业硕士是近两年出现的新方向，在各地人事管理部门提供的目录中，有的就没有这个专业可供用人单位选择。有些地方知道我们的人才培养计划，事先沟通，并向当地人社部门做争取，把我们专业加到了目录里。但更多的单位不了解我们的培养情况，所以还存在培养人才与用人单位对接的问题。

古籍修复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专业，但修复只是一种补救性的手段，拥有这项技术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献。我们希望学生通过专业学习，掌握文献保护的理念和措施，而不仅仅是专注于某一项技术。从这个角度来说，学生就业的适应面应该更广阔些。即使以后不能在修复岗位上工作，也能将所学运用到图书馆、文博单位的其他岗位上，甚至用在印刷、出版、教育等其他领域里，有利于扩大社会各界对古籍保护与修复的认知，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籍保护、认识古籍保护。

建议：申请独立的古籍保护专业硕士门类

藏书报：根据这几年的经验和思索，您对推进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向目标发展有何建议？

林明：近两年，在几次学科建设的讨论会上，大家提出并讨论了很多的问题。首先，作为高端人才培养，教育部有很多规定，而这些规定很难灵活适应人才培养的需求。比如文献保护与修复，无论挂靠在图书情报或文博专业下，培养方案制定，包括学生的招生都不能独立进行，所以进行古籍保护与修复方面独立的学科建设，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从现实的情况看，困难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要求有相对明确、有别于现有学科的研究范围和方向，但是古籍保护修复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还比较少，个人认为还没有凝练出独有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可以将培养实践人才和学科建设同步进行，先向教育部申请一个古籍保护的专业硕士门类。申请专业硕士门类比一级或二级学科要容易一些，而且对于招生和培养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能比较有针对性的满足我们实践领域的需求。

虽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时机还不成熟，但涉及古籍保护的研究却不能不进行，并且现在很多学科都可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古籍保护涉及到化学、材料科学、轻工工业等，一些学校的相关专业硕士或博士论文就是与此相关的。这也说明，古籍保护学科涉及到的范围比较广，目前还没有凝练出其作为一个学科独有的研究内容。所以，还是建议先把申请独立的专业硕士门类作为主攻

方向。

另外一个问题是经费问题。像这种消耗很多材料和实践类专业，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是很难实现高质量培养人才的要求的。目前，我校的文献保护与修复方向有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资助，极大解决了操作实践和修复材料的供应，以及学生田野考察教学的需求。但从长远来看，还需要很多经费支持，学费是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所以，我希望能像国外那样，得到专业基金的资助。据了解，美国现在有三家文献修复专业的大学，都得到了美国梅隆基金会的支持；以前美国德州大学也是得到了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支持，并连续支持了十几年。这是个好的方式，还需要我们不断努力。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 高端访谈

杨光辉：

人才和经费是关键问题

□本报记者 刘晓立



杨光辉：
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2014年11月，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在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提议和支持下正式成立。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国家急需的古籍保护高端人才，保护、整理和传播中华古籍资源与中华文明。与此同时，复旦大学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签订联合培养“古籍保护方向”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协议，并于2015年开始招生，今年已是第三届。

藏书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杨光辉：研究院招收的首批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共33名，有图书馆管理、信息服务及数据管理方向等，其中，古籍保护方向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资助，每年10名，第一年招收11名；第二年有14名学生，其中3名是地方文献保护与地方志编撰方向试招生，还有首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留学生；第三年13名。他们几乎都来自不同的专业。

作为一个新设立的专业方向，古籍保护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师资力量和课程设置两大难题。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之初，就将科技保护作为研究方向和人才培养的重点，但传统古籍保护这方面基础较弱，因此，除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师资力量外，我们还邀请了化学、高分子材料学、生物学等院系的专家教授参与相关研究及人才培养。

对于课程设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书籍检测、版本著录、科学修复。学生需要对书籍进行科学检测，从中获得纸张酸碱度、老化度等信息，并完成检测报告；另外，因为是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就要了解一本书的图情信息、在全世界的收藏分布及其版本流传情况等，做好版本考证及编目工作。评估一本书，有两个方面的数据需要了解，即其载体数据和人文方面的价值数据，这也是我们开设相关课程的原因。最后才是具体的修复工作。

藏书报：古籍保护方向下面又有好几个小方向，检测、版本、修复全部学习，两年时间会不会很紧张？

杨光辉：现在主要分检测、编目、修复三个方向。地方文献保护与地方志编纂方向属于试验阶段。从学制上说，2年实在很紧张，除了专业课程外，他们在第一年还有公共课，第二年又面临实习、求职，会分散很多时间和精力，所以，我们之前就一直在考虑学制变成3年，在学校研究生院的支持下，2018年开始，我们已将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包括古籍保护方向改为三年制。

藏书报：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古籍保护方向的研究生最后要提交的不仅是单纯的一篇文章，还包含一个综合性的报告？

杨光辉：是的，学生的毕业设计包括三部分内容。古籍保护不单是图书情报学，也不单是古典文献学，其论文要有古籍保护自己的特点，符合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目标。从目前来看，我们将科技、人文与技艺传承结合起来，希望能够代表古籍保护未来学科建设方向，至于这三方面如何很好地结合起来，需要探索，尤其要看学生实际的接受能力。

目前，我们对学生的要求是，三个方面都要了解，但可以有所侧重。比如以修复为主的学生，检测跟编目在毕业设计中的部分就可以少一些、简要一些，其他方向也是一样。

藏书报：既广且专，学生在就业时一定非常有竞争力，那第一届学生就业情况如何？

杨光辉：我们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签署协议，联合培养古籍保护方向专业硕士，是满足古籍保护对高端人才的需求。高学历人才可以把学习经验总结书写出来，传承给后代，而很多老一辈的技艺传承人，因没有经过系统的学历教学，要写出来就很难，因此，古籍保护方向人才培养成为全国唯一获得国家支持的专业硕士。国家贴补进去很多钱，就是希望古籍保护后继有人。从首届11位毕业生就业情况看，除一位出国外，有四位进到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两位，上海图书馆一位，浙江大学图书馆一位）从事古籍保护相关工作，其他则大多选择了上海的文化机构、银行业及房地产等，少数到外地就业。

总体上看，直接从事古籍保护的毕业生比例不够理想。造成这种结果的关键之一，就是这一批人才的待遇及出口问题没解决，古籍保护的待遇不提高，学生就业的意向自然就弱。当然，怎么提高待遇也是个麻烦事儿，以前的从业人员文化素养普遍不是很高，专业技能级别相对较低，普遍提高的话就会对用人单位有很大的压力；新培养的这批人如果没有好的就业市场和就业环境，就会不愿意做，毕竟选择很多，像银行里数钞票的人，很多都是硕士学历，你说没必要，可这个行业却能够吸引高层次人才趋之若鹜，哪怕是数钞票。我们的杨玉良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乐观地说，银行不会做亏本买卖，将来字画文物的银行托管会越来越多，他们不仅是去数钞票，更有可能去做文物典藏服务。

所以说人才培养很重要，人才出口更重要，用文化部杨志今副部长的话说，就是“要让古籍保护者能够活得有尊严”。那怎么有尊严呢？首先就是提供一个好的就业环境，待遇有保障，但目前还做不到，这也是我最担心和无奈的地方。花了那么大力气培养他们，聘请一流的大师级人物手把手教他们，甚至带他们去日本、韩国考察古籍收藏、保护与修复，到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大、清华图书馆以及扬州线装古籍印刷厂、扬州图书馆、雕版博物馆，泾县制墨与造纸生产基地、嘉业堂藏书楼等地考察实习，希望通过打开眼界、增强技能的学习，为古籍保护提供高端人才，可最后，他们却不见得能从事古籍保护工作。

藏书报：是啊，人才培养出来却不能为古保服务，确实让人叹息。

杨光辉：这就是人才培养和人才出口之间的矛盾。复旦大学地处上海，很多学生毕业后首选还是留沪，可是上海一些大馆这几年已经进了不少人，缺口自然没那么大；其他如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等也有很多古籍，但又涉及进人体制问题；外地如湖北、四川、重庆、山西、贵州等地都有人才需要，可是对毕业生的吸引力不够，这又是一个矛盾。如果学生可以定向招生培养，倒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可是我们的专业硕士又必须通过国家统一考试，定向招生有政策限制。

从积极的角度考虑，我们至少培养了一批对古籍保护有认识的人，他哪怕去从事别的行业了，将来对扩大我们的基础和影响力也很有用。毕业留沪的同学就很乐意来研究院做线装家谱制作项目的志愿者。

古籍保护作为一个『国家工程』，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藏书报：说来说去，其实最主要还是待遇问题。

杨光辉：是的。古籍保护现在国家的投入还是太少，虽然已经写进了国家十三五规划的一百项重点工程。但是，据张志清副馆长（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说，2007年以来，国家古籍保护计划专项经费每年2500万（地方各级政府投入没算），十年2.5亿，我们一算，大概是造两公里地铁的费用。如果没有大量的钱用于提升古籍保护行业的就业环境和待遇，那一切都是白费。就像国家现在设了全国古籍保护重点单位，但是重点单位没有专项经费保障，不少单位甚至没有合格的专职保护修复人员。

藏书报：全国古籍保护重点单位没有相应的经费投入吗？

杨光辉：没有，我们认为应该制定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的基础设施标准，条件达不到的，国家给予一定支持，最终达到了就保留，达不到就摘牌，这样才能体现国家古籍保护重点单位的意义和价值。

比如，现在申请全国古籍保护重点单位的一个硬性指标就是，收藏多少古籍文献，那这些古籍文献需要配多少人来保护，馆藏环境有什么要求，公众服务及研究利用如何体现，破损书籍如何修复等等，这些都要有一定的标准和配套，这才是国家工程要整体解决的问题。杨玉良院士在研究院两周年紀念会上对张志清副馆长说，一个国家工程起码1000亿，那这1000亿怎么体现出来？就是要从整个馆舍环境开始，改善典藏条件，将来进到古籍保护单位，要有一种进宗教圣地的神圣感，要让人心生敬畏……现在破破烂烂的地方，由几个没有专业基础的人来管理，谁会把里面的东西当成文物或宝贝？

藏书报：做成一个“国家工程”，哪些方面还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

杨光辉：我们觉得有几个需要资金投入的地方：首先是馆舍等硬件设施。其次是高端科学实验室建设。再次要结合规范数据库建设，建立国家古籍书目数据库。另外，建设国家纸谱和墨谱。纸谱可以将中国历代古籍的纸张形态、物理化学性质及其现存状况等进行科学测试。有了纸谱，将来对书籍可以进行科学的断代测试与研究。

目前，我们正在研发无损检测或微损检测技术，包括确定一本书的规范检测流程——确定哪几个属于必须检测的点，可作为基本信息采集目标，为古籍保护信息学做准备。

藏书报：这确实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以前好像都没听说过呢。

杨光辉：一般人不会想到，也接触不到这方面问题。我们也是在杨玉良院士的带领下，多种学科碰撞后，才发现可以做这么多事情。杨院士更多关注的是古籍保护中的科学与技术问题，即如何运用现代科技来解决古籍保护尤其是纸墨等写印材料长久保存问题。我觉得科学技术是重要的手段，不过，最后还是要回到对书籍载体与内容的认识、欣赏以及文化传承这一目的上来，这也可说是我们古籍保护的终极目的。

藏书报：这样一来，我们要如何界定古籍保护的学科范围？

杨光辉：古籍保护现在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的安平秋先生在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讲“大文献学”——古籍保护（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古籍整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与古籍出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三足鼎立，是很好的一种归纳。但是，涉及到与我们现在所做的、科技保护相关的古籍保护内容后，就会发现，古籍保护已跳出了传统文献学乃至安先生所说的大文献学的范围，它是更大范围的与众多学科都有交叉的一门新兴综合性学科。

一本书就像一个人一样，它是有生命的，对其保护也是需要全方位的，而不是像西医一样，只是局部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古籍保护需要全面了解书籍，古籍保护工作者就像“书籍医生”，既要了解书籍的内容（类似人的精神），也要了解其载体（类似人的身体），所以它不仅包括文献学内容，还包括高分子材料学、化学、微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信息学、环境科学、建筑学、传播学、书籍史以及文史哲、政经法、艺术学等相关领域。所以，我们当初成立研究院的时候，就是希望建立一个学科交流平台，让不同院系的研究者来参与古籍保护工作。

课程包含检测、编目、修复三部分



马泳娴：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2015 级图书情报专业（文献保护与修复方向）研究生，于 2017 年 7 月毕业，现任职于广州图书馆，担任图书馆馆员。

虽然目前没有从事文献修复相关工作让我稍感遗憾，但我仍十分感激两年间所学习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保持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补洞前对纸张方向的把握，修补时对搭口大小的拿捏，完成后对书叶平整的处理……等等，修复中的每个动作看似轻盈自然，实则心头悬着秤砣，一分一毫都要看在眼里，念在心上，最后落到手下。除了技术层面，我在跟随老师学习版本学、造纸史、文献保护管理等课程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严谨认真对治学、做人和工作的重要性。

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记得走进修复室的第一天，老师就再三强调，无论是修复过程还是善后工作，都要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因为一个不经意间的失误很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后果。慢慢地，我也养成了诸如注意桌面整洁、规整工具材料、每日整理善后等习惯，而这些看似



董天舒：2016 级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专业（文献保护与修复方向）在读研究生。

往后看，我们埋头走了很长的路，学习了很多专业知识；往前看，好像还在起点，因为手上的功夫就算是五年、十年也未必纯熟。

理论课带我们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去了解和认识古籍：版本学要求我们从不同年代的特点出发，考量古籍的源流；文献保护管理课程让我们认识到保存环境对文献的深远影响；书史课程中，我们学习了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书籍的编撰和出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在实践考察课中，我们赴西南地区以及德国进行了考察学习，我们见到了几十年如一日的修复工作者、因为兴趣而牺牲休息日来图书馆帮忙的志愿者，也见到了苦行僧般执着的修复师。一方面，从事古籍修复行业的人们不急于求成，他们守着几十年、半辈子的光阴，追求质的提升；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每一日的工作量严格要求，讲求量的积累。

古籍修复实践课包括中文线装书修复、西文书修复、字画装裱等，这些实践课教会我的是耐心、是专注，是就算做了几个月，最后拿出成果时发现细节错了，也得有推翻重来

的勇气；也教会我时刻保持整洁，桌面上不得放水杯和食物，工具用完要马上归位，待修的书要压好放稳；还教会我时常记录，领到的书要拍照，把重要的信息记录下来，以免书拆开以后忘了次序。类似这样的细节有很多，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的是最简单的道理和最基础的好习惯，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看似简单基础的步骤却最弥足珍贵。

在我看来，古籍修复工作者的作用跟连口纸很像。连口纸去连接两张断开的书叶；古籍修复工作者修复破损的书叶，让其完整。连口纸要力求在书合上时存在感为零，不露出头脚，甚至稍有了厚度也要用敲锤敲打下去；古籍修复工作者则力求收敛成果，让旧书保持它原来的气息，修旧如旧。

现在我们即将面临找工作的问题，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所学专业与岗位要求完全对接并非易事。但我相信学校里培养的是学习能力，走出校园是把学习能力转化为适应岗位的能力。一年很短，很快就会毕业，而学习古籍保护的知识和学问，应该是持续终身的事。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实施已经有 3 年的时间了，第一批专业硕士也已经毕业走向工作岗位，他们有的将所学投入到工作中，成为古籍保护的新生力量；有的转投他行，并未从事相关工作。但不管身在何处、肩负何职，老师们言传身教的道理和精神一定会扎根于学生心中，为古籍保护做好人才储备。

古籍保护，我们梦想的舞台

冯雪茹：天津师范大学 2016 级文物与博物馆（古籍保护方向）在读研究生。

作为一名古籍保护方向的在读硕士研究生，已经一年有余。由于学制的限制，最近时常生出“时光如水，不待我辈”之感，为还未牢牢掌握的古籍修复知识而忐忑，为剩余学习生涯的未知变数而踟躇，但唯一坚信的是，古籍保护方向有着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远大的前景。这个前景，是古籍保护界前辈们披荆斩棘开辟而出的，也是在古籍相关学科领域老师们的大力支持下兴盛的，更和国家对于古籍保护事业的大力扶持密不可分。

天津师范大学于 2015 年开始招收古籍修复与出版方向的专业硕士人才，同时兼顾古籍的原生性和再生性保护，实行双导师制。由天津图书馆李国庆老师、万群老师，以及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张伟社长分别指导学生校外学习；校内也拥有一批涉及考古、文物、古典文献、博物馆学等多方面的专业教师。此外，校内图书馆特藏部也提供了空间充裕、设备齐全的古籍修复实验室作为同学们的校内实践基地，与校外实践相结合，增强学生动手能力。

在拟定的专业硕士培养计划中，学制 2 年，课程不仅有英语、政治等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选修课与学术讲座，还有实习、毕业论文撰写和答辩。课程设置中的专业必修课有历史文献学、古籍保护要籍介绍、古籍保护概论、文物学、博物馆学、考古学，专业选修课有陶瓷器、青铜器、书画鉴定与保护等，实践课程有古籍修复技艺和古籍出版与再生性保护。实习在实训单位进行，目前的实训单位主要是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天津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和天津古籍出

张竹悠：本科曾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的文物鉴赏与修复专业。2015 年考入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专业（文献保护与修复方向），于 2017 年 7 月毕业，现就职于厦门大学图书馆，从事西文书籍修复工作。

在南艺和中大的学习经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而言，研究生时期的学习内容更加“专”且“全”。“专”体现在研究的对象上。本科时，我们首先全面学习了陶瓷、书画、古籍等文物相关的知识，然后才进一步选择专业方向进行古籍修复的实践；而研究生的学习则专注于文献这个单一对象。“全”指的是研究的范围。本科的古籍修复课程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古籍的版本学知识与修复方法。到了研究生时期，我逐渐认识到，文献修复的对象除了中文古籍，还包括西文图书、胶片、磁带等一切信息载体，而我们的任务也不仅仅是将一册书籍修复完整，更在于通过合适的方式让这些文献更长久地保存下去。在考虑保存方法时，除了着眼于珍贵古籍，还需要考虑收藏机构整体馆藏的状况，如此种种，使我对文献保护的

理解更加全面了。同时，通过中大搭建的平台，我有机会外出游学并多次参与古籍方面的会议，借此与更多文博从业者接触，在增长见识、开阔眼界的同时，增强了对所学专业的使命感。

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仍与我的专业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我能够完全将之前学习到的知识、技能与思维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此外，通过这几个月的工作，我愈发感受到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修复中的重要性，尽管已经有一定的学习基础，有时也不足以解决实际遇到的复杂问题，幸而可以与同学们进行探讨，或向母校的老师们寻求帮助，这才让我的修复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对现在的我而言，成为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文献保护人才还有一定难度，但通过自己的不断实践及学校构建的学术交流圈，相信可以在离开学校后仍然有所提高、有所成长。

